

“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综述

宋 伟

2013 年 12 月 7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创造的核心概念,并比较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的异同,提出如何及是否可能创造出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的、带有中国学者印记的核心概念及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创造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董青岭副教授认为,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沉淀、反思和积聚力量的阶段。原因在于:(1) 国际关系的理论哲学正在理性回归本土并试图推陈出新,具有本土特色理论反思和思想创见已进入一个萌芽再生阶段;(2)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多元性和包容性正在增强;(3)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正在从思辨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思辨导向的研究可能继续朝向大理论构建努力,而问题导向的研究则可能朝向中小理论的创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副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好的概念的标准。他认为,就概念生成的标准而言,好的概念应该指涉广泛的、普遍的经验现象或驱动因素,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为人们所熟悉并已于接受,同时,引入新的概念能够在理论上增加新知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宋伟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结构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学者所使用的国际格局概念十分庞杂。与国际结构概念相同地方在于,国际格局的概念也指向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分配。但是,对于什么样的行为体可以构成格局概念的单元(单位),有学者认为国家集团、小国

* 宋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或者国际组织都可以成为格局的单元,而国际结构的概念只包含单个国家;一些学者在探讨国际格局的概念时,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不仅包含国家间的实力关系,也包括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有国内学者则把国家间的实力关系和权力关系放到一起;还有一些国内学者没有细致地区分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因此,国际格局的概念本身存在统一认识,缺乏国际结构概念的严谨、简明和统一。

围绕着下一步中国学界如何创新核心概念、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与会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董青岭副教授认为,随着量子思维的兴起和古老东方互补哲学的再发现,国际观察或可超脱于“二元对立”之外。“复合建构主义”分析架构重新诠释了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盛行的“结构”概念和“过程”思维,试图以一种本土化的二元互补思维作为理论基底,构建视角并阐述宏大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之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刘丰副教授认为,从概念生成的路径考虑,中国概念与既有知识体系的嫁接至少可以通过三种路径实现:(1)引入全新的概念表述某种类似现象,如中国学者可以用“朝贡”代替“等级”,用“天下”代替“无政府”;(2)接受既有概念并赋予其不同含义,如中国传统思想中倾向于区分王道与霸道,而西方理论中的霸权一词可以涵盖仁慈霸权和邪恶霸权;(3)增加修饰性和限定性语汇对既有概念加以更新和改造,这意味着对既有概念作出新的类型化,如基于中国古典思想可以将“治理”区分为礼治、人治和法治,或基于中西方差异区分为关系型治理和规则型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薛力副研究员阐述了他所提出的“孔子文化”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子文化,与康德文化不同,孔子文化是一种辩证思维,主张作为个体的人与人是不平等的,需要用“仁义礼智信”来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主张家国同构,国家是一种放大的家庭。国分五服。内三服(甸服、侯服、绥服)之内用三纲五常来建立秩序、分配利益。外二服(要服、荒服)地区,通过礼乐进行教化,而非征伐。孔子体系的特征是自愿等级制。赋予等级制以正当性,也就是说,在承认国家之间有平等的一面,也有不平等的一面。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历史事实与现实存在。中国认为本国的实力、能力与吸引力决定了中国是亚洲的领导国,但愿意为地区内国家提供安全与其他区域公共产品,让其分享经济繁荣,保持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孔子体系的范围是地区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区域文明,缺乏普世性与全球扩张性,很难为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接受,从而实现全球性的文化领导或曰文化霸权。他认为,未来中国建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包括上述三个方面,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巍副教授从矛盾中国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按照最经典的定义,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和解释。如果从这个最狭窄的范围来定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很难再有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突破,特别是大理论的突破,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其规律性总体上比

较弱,而不确定性比较强。但是,如果放宽对理论的定义,认为对某种现象或某类现象的抽象性表达也算是理论,那么中国学者现在正处在一个创造大理论的好时机。首先,国际关系的演进正在经历一种根本性变迁,即大国之争很难再爆发大规模战争,同时,大国之间有强大的动力来寻求共同利益;其次,中国在今后会有什么迥异于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将直接决定中国学者会创造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未来的实践,就有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主权学说。中国学者当下最需要做的就是,去除浮躁,练好基本功(历史和方法),完善学术制度。中国学者理论创造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外交实践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讲求“微言大义”,因此,理论的创新应该简约。同时,在对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既要寻找共识,又要鼓励差异,中国学者应该继续努力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张小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也特别谈到,理论的创造要突出包容性和多元性特点,理论应该有想象的空间,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